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许守泯

(成功大学 历史学系; 台湾 台南)

一、经历简介

萧启庆教授是当今海内外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萧教授生于 1937 年，祖籍江苏泰兴。1955 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姚从吾先生（1894—1970）启发。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后来负笈德国，受到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班汉姆（E. Bernheim）影响，回国后结合兰克史学和干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

萧教授在姚先生的教导熏陶之下，选择以蒙元史为研究领域。1959 年完成学士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并考进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仍跟随姚先生研习蒙元史。1963 年提交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同年并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在哈佛大学，萧教授主要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与杨联升两位先生。杨联升先生以博学多闻知名，其治学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和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柯立夫先生则师承二十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萧教授在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并由哈佛大学于 1978 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萧教授于 1969 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先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1974 年转任新加坡学历史系。1994 年应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返台任教，讲授“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2000 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 年退休，荣聘为清华大学历史所梅贻琦荣誉讲座教授至今。

二、研究取径与重心

萧启庆教授认为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着重纵向分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而萧教授的研究重心，早年较重视第一条主轴，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但萧教授也体认到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中的地位。

三、出版著作

截至目前，萧教授已经出版专书两册，联合编着三种，论文集五册，分别是：专书《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联合编着方面，与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陈学霖两位教授合着《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Wiesbaden :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并参与撰写《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元代中期政治」部分。1999 年, 萧教授于台北主办“海峡两岸蒙元史学术研讨会”, 联合编着并出版《蒙元的历史与文化: 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2001)。论文集则有《元代史新探》(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蒙元史新研》(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元朝史新论》(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2007 年更结集三书中二十三篇论文, 出版《内北国而外中国: 蒙元史研究》上、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可谓三书之精华版。紧接着 2008 年又出版《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整体而言, 萧教授的研究成果涵盖蒙元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人物评传与综论等方面。

四、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

屈文军《四十年来萧启庆教授的蒙元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 年第 1 期, 14-20 页)一文详尽介绍了萧教授对蒙元政治史、军事史、军事制度史、元代汉文化之延续与影响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下就萧教授对社会文化的相关研究, 分社会与族群文化两项加以介绍。

(1) 对元代社会的研究

对元代社会的研究, 萧教授自言这是他用力最多的一个领域。从社会阶层来看, 元代社会阶层与前代的主要差异在于新旧菁英阶层的更替, 即中原社会传统菁英“士人”(儒士)地位较前代低落, 起而代之的是一个皇室家臣集团, 即当时所谓“大根脚”家族。〈元代的儒户: 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一文即透过儒户的法定权利与义务而探讨儒士在元代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该文显示, 儒士虽然失去唯我独尊的传统地位, 但与当时的僧道相当, 仍然享有不少经济上的优待, 仅是仕进之路较前狭隘。因此在士人地位的演变史上, 元朝儒士地位特殊, 却非特别卑下, 修正了因「九儒十丐」一辞引起的种种误解。

《元代四大蒙古家族》一文是四个最为潢贵家族的历史, 研析蒙古统治菁英阶层的性质和演变, 反映蒙元政权具有韦伯(Marx Weber)所说“家产制”(patrimonialism)的性格, 即是政府为皇室家务组织的扩张, 而皇室家臣则构成最高统治阶层, 终蒙元之世未变。

《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一文探讨六个重要汉军世家的历史, 显示汉军世家因在征服中原过程中立有大功, 取得家臣身份, 成为蒙古社会中的统治菁英。汉军世家的历史显示出元代政治地位及社会身份的取得决定于「根脚」而非「民族」。

《蒙元时代高昌偃氏的仕宦与汉化》是以一个家族的历史检视色目菁英阶层的政治与文化演变, 指出偃氏原为突厥、回纥、畏兀儿等国世家, 因归降蒙古时间较早, 亦跻身皇室家臣之列, 以致仕宦不绝, 但汉化较深, 故兼具“根脚”与“科第”双重身份, 情形较为特殊。总之元朝统治菁英阶层甚为闭锁, 重家世而轻成就, 与中国近世各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另外, 萧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元代社会与科举”的计划, 包括有两部分: 第一部份是《进士录》的重建, 第二部分则是根据《进士录》探讨科举恢复对当时菁英构成及中国近世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一部份的各科辑录已陆续发表, 并辑为《元代进士辑录》一书, 即将出版。

与第二部分相关发表的论文有《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 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元朝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沈》等文。

《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一文从社会史的观点着眼。萧教授使用十余年前发表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为根据，以该科百名进士为分析对象，从仕宦、户计与婚姻三方面考察进士的家庭背景，探讨科举制度与菁英流动的关系。基本上，元统元年进士中「新血」的比例较宋、明两代为低，而各族群进士中新血的比例又因种种因素而颇有差异。不过要注意的是元统元年进士的统计未必能够完全反映其它十五科的真相。

《元朝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探讨蒙古、色目进士的社会流动及其与汉族间的社会、文化互动。本文显示多达八成的蒙古、色目进士出身于官宦家族，而来自布衣之家的不过二成。从社会观点来说，大多数进士是蒙古、色目族群中传统菁英家族的延伸。从文化观点来说，蒙古、色目进士是其族群中汉化最深的一群。

《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是以「南人」进士家族为基点，探讨元朝在近世士大夫家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基本上，元朝的科第之家实为宋、明二代士大夫阶层的桥梁。江南士大夫阶层有颇大的稳定性，未因征服王朝的介入而中断。

《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考述元朝进士的区域分布及其历史意义。本文从行政区划的省、道、路三级研析元代进士的分布，又借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经济社会体系”理论，同时兼顾文化、教育因素，讨论宋、元与元、明之间的进士分布的延续与变化，藉以显示近世中国人才分布的趋势及元朝在其中的地位。

这三篇论文显示，就科举制度的规模而言，由于元朝恢复科举的目的仅在为原有以特定标准选官用人的方法增添一个补充途径，因而考试规模始终狭隘，竞争空前激烈。就菁英流动而言，元朝科举产生的官场新血少于宋金明清等朝，但考试对各族群的影响大小不一，许多蒙古、色目、汉人进士来自元朝官宦家庭，不少南人进士则出身南宋仕宦家族。就科举对文官构成之影响而言，元代进士多数以中品官职终仕，有五分之一仕至高官，但因进士仅占当时文官的3.4%，显示科举对元朝政权封闭性的特质影响甚小。

（2）对族群文化的研究

由于元朝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所以族群政策和族群关系成为元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是萧教授多年来注意的一个焦点，主要探究元代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蒙古人的汉学与汉化，以及多族士人圈形成等诸多议题。《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一文显示元朝族群政策之宗旨不在于达成族群的和谐与统合，而是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压制与分化，这个政策严重影响族群关系，造成族群关系在各方面产生很大落差。尤其在政治、经济方面，蒙古、色目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始终以压迫与剥削为主调，导致族群冲突与对立，而元朝之覆亡与族群关系之恶化有密切关联。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一文根据现存史传、诗文集、剧曲集、方志、石刻及美术等数据，考述117名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画家的生平及造诣，显示不少蒙古士人的汉学造诣深湛，足与当世汉族及色目名家争胜。论者多谓此文可与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并行。之后又作《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一文则全面检讨蒙古人的汉化问题。除了评估蒙汉二族交融的有利及不利条件之外，并考述二族之间实际交流的状况，指出：蒙古人徙居中原、江南达百年之久，不得不改就汉地的生活方式并与汉人杂居、交往、通婚，不免深受汉文化影响，并从名字、礼俗及汉学三方面较为具体衡量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本文主旨在于就蒙古人汉化问题作一平允之论证。

《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游寓兴诗集〉》系根据在日本发现的金哈刺诗集，考述其

人之族属、家世、科第、仕历、诗集流传及其文学价值，并进一步指出：金哈刺虽出身汪古族，在汉文化中却浸润极深，其诗歌所反映的生活、思想及情趣与汉族士大夫并无不同，在政治上却与元室同舟一命，安危与共，最后不得不以身家殉国，反映出元末蒙古、色目菁英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相互抵牾的困境。

萧教授从研究蒙古人汉学的过程中，注意到元代中后期熟谙汉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已经形成一个士人阶层，这个新兴的蒙古、色目士人阶层并非孤立于汉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造诣、兴趣与品味，与后者紧密结合，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因此萧教授萌发「多族士人圈」的概念，陆续完成数篇论文，其宗旨在证明元代中期之后一个多族士人圈业已形成，各族士人透过姻戚、师生、座师、同年、同僚、同乡等关系，建立紧密社会网络，并且共同参与诗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题跋及著作编刊等文化活动，频繁互动，各族士人并且能有共同的族群意识——信仰、价值、行为规范及政治理念——乃能融为一体。相关论文，有《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元代蒙古色目士人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元代各族士人间的文化互动：书缘》、《元代多族士人的雅集》、《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元季色目士人的社会网络：以楔百辽逊青年时代为中心》、《元代多族士人社会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九州岛之外有斯人：元代多族士人的群体意识》等文，都是与族群文化相关的课题，亦将结集出版。

此外，有三篇与社会现象相关的论文，分别是《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及《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三文探讨宋元及元明之际的遗民现象。《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一文综论宋元之际江南汉族士人对于朝代鼎革的重种反应，显示：面临宋元之际的巨大变化，江南士大夫做出不同反应，有的遁迹山林，为故国守节，成为“遗民”；有的改仕新朝，成为“贰臣”。而“遗民”中的政治光谱，从心存复国、言行激烈的“激烈型”到忠宋不反元的“边缘型”，态度相差甚大。而且遗民现象的存在甚为短暂，前后不过三十二年。

《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可说是遗民研究的另类思考，有别于向来仅着重于汉族王朝覆王之后汉族士人动向的研究，本文则以元朝灭亡后蒙古、色目遗民的行为和思想为探讨对象。蒙古、色目遗民与汉族遗民相较，有相同处亦有不同处。相同之处，各族遗民皆出身士大夫阶层，而且都因绝对忠君观念的影响而拒仕。不同之处，蒙古、色目与汉族在元、明二朝所处的地位不同，所受明太祖「本土化」政策之冲击亦全然有异，因而蒙古、色目遗民的亡国之痛与眷怀故国之激情更甚于汉族遗民。蒙古、色目遗民虽无强烈的遗夏观念，却成为族群政治的牺牲品。

《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则以各族进士为中心，探讨士人对元明鼎革的各种反应。本文胪列易代之际的进士共 144 人次，据其抉择差异分为三型：一、“忠元”型：包括殉国忠义、北归外奔及守节遗民，比率高达 60.4%。二、“背元”型：出仕群雄与明朝，比率为 31.3%。三、“隐遁”型：乃指元亡之前即已退为“逸民”者，比率 8.3%。可见多数进士选择忠于元朝。这一结果与宋元之际南宋进士对易代的反应相差不大。自族群差异言之，“忠元”型进士中，四大族群皆占一定的比率。可见殉国或守节是一种超越族群藩篱的现象。因此，元明易代虽是中国史上第一次“由夷入夏”，但真正影响士人对生死与仕隐抉择的因素是“君臣大义”，而不是“夷夏之辨”。

五、小结

回顾二十世纪蒙元研究的历史，萧启庆教授感觉到在方法与方向上都有了重大变化。萧教授认为：30 年代第一代的学者偏重以语言学（philology）的方法从事各种语文史料的比

勘与译释，以及名物的考证，可说是文本取向。第二代学者较为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探讨趋势，但选择主题比较偏重横向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和文化上的特色。而今后的元史研究应着重直向研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萧教授的蒙元史研究，从政治、军事逐渐转到社会、族群文化、人物的研究，正是蒙元史研究两条研究主轴并重的最好证明。最后，以萧教授学术自传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之结束：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研究数量不算庞大，内容也未必精彩。毕竟人文与自然科学性质不同，很难说甚么才是突破性的研究。重要的是，每项研究都必须具有意义，一点一滴的累积，聚沙成塔。我的研究也是如此，谈不上甚么惊人的发现，不过是在元代政治、军事、社会、族群、人物等方面，将研究前沿略微向前推进。如果有任何成就可言，主要由于我对一门冷门学问的执着与坚持，抱着「千山我独行，何必相送」的襟怀，多几分傻劲，少几分功利。

收稿日期：2008-12-5

作者简介：许守泯，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